



颠覆传统声音 构建女性意识

——伍尔夫女性主义叙述声音解读

■ 邓琳娜

声音是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批评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在伍尔夫的小说中,叙述者声音隐含在多元的人物声音之中,具有自我指称意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的女性意识。伍尔夫采用不同的声音策略巧妙地对抗意识形态、社会权力关系和文学规约等对女性声音的制约,从而取得了话语权威,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体现了这位女权主义先驱在文化实践中的艺术特色及其女性主义思想的独到性。

[关键词] 伍尔夫; 叙述声音; 作者权威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0)05-0120-04

邓琳娜(1979—),女,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语语言学。(江西南昌 330006)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多丽丝·莱辛小说女性主义思想与艺术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WGW0906)、南昌大学社会科学学校研究基金项目“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的英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09XWW01)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肖尔瓦特在《她们的文学》中认为:“在英国小说的版图里,女性的领土通常被描绘成四周被山峦包围的荒漠,这些山峦即奥斯汀巅峰、勃朗特峭壁、艾略特山脉和伍尔夫丘陵。”^{[1](Pii)}弗吉尼亚·伍尔夫无疑是英国女性作家中最具颠覆性和创造性的人物之一。面对极其匮乏的女性文学传统和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不仅用手中的笔为新时代女性树立了自强不息的榜样,还对女权主义进行了超越时代的思考。这除了她自身拥有的艺术才华外,还在于她能恰当地处理社会、环境和创作的关系。反映在文本中,就是她采用了迂回巧妙的叙事策略,以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颠覆了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学创作方式,创造并发展了现代派女性美学。本文拟从女性主义叙述声

音切入,解读伍尔夫在小说创作中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方式,探讨她是如何使用不同的声音形式对抗意识形态、社会权力关系和文学规约等因素对女性声音的压制,从而取得话语权威并表达女性意识的。

一、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与女性叙述声音

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学研究的形式分析与女性主义批评的意识形态分析融为一体,为我们分析作品中叙事话语的特殊性和叙事形式对性别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从1986年苏珊·兰瑟首次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范畴起,女性主义叙事学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从早期聚焦于叙事中的女性人物的功能到近年来关注叙事作品在文化中的性别结构方式,女性主

义叙事学正逐步融入更为广阔的文化大语境中。作为一门跨学科叙事研究流派,女性主义叙事学既为女性主义文本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也丰富、补充了经典叙事学范畴。

“声音”在女性主义中是身份和权力的代名词,可以指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见解,甚至行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叙事学中的“声音”本指叙述者的声音,但在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的影响下,叙事学者将这个概念扩大至叙事文本产生的所有声音,包括文本内的叙述者声音和人物声音以及文本外的作者声音。兰瑟将作为形式的叙述声音置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总结了女性叙述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及女性叙事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学条件,从而构建了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理论。兰瑟将叙述声音分为作者型(authorial)、个人型(personal)和集体型(communal)三类。作者型声音是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2](P17)}作者型叙述者以虚构的形式置身于叙述文本之外,拥有判断、阐释、评价和总结的宽广余地,具有真实感和可信度,能获得较强的叙事权威。个人型声音指叙述者有意识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声音。个人型声音的叙述者通过讲故事建构的自我形象很容易遭受社会约定的抵制,这也使个人型声音的女性权威大打折扣。集体型声音指以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赋予一定规模的群体以叙事权威的叙述行为。集体型声音使女性这个受压制群体获得叙事权威成为可能。兰瑟的这种分类与经典叙事学家从叙述者与故事的位置层次关系来区分不同,她是根据叙述者与讲述内容的关系来区分叙述声音的,这样的分类有助于她将叙述声音的形式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考察。^[3]伍尔夫所处的英国社会仍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发声受到扼制,女性形象受到扭曲。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伍尔夫以作者型叙述声音,这种最古老最基本的叙事模式有效地“产生或再生了作者权威的结构或功能性场景”^{[2](P18)},使作者声音在各叙述形式中占有优先地位,作者声音拥有了更大的表述空间,把人物声音和叙述者声音统辖在内。同时,伍尔夫以申明女性话语的在场打破了男权一统天下的局面。

二、多元化人物声音——女性声音的表达空间

福楼拜的“非人格化”叙述强调作家在叙述过程中保持超然,以间接方式表述自己的情感和观点。詹姆斯与卢伯克也提出小说应最大限度地降低全知叙述者的

叙述声音,以人物意识、人物观察和人物声音透视故事情节,把完整有序的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产生直接的戏剧效果。同样,伍尔夫也非常重视人物意识深层的描写。她采用意识流创作手法,捕捉、描绘各种不同的人物声音,让这些声音在自由流动中施展美学生命。这种飘逸飞动、委婉多姿的散文诗笔法与女性思维深处的底蕴是相通的,有利于表达女性思维。这种新的叙事手法也起着解构男性话语权威、建构女性自我权威的作用。伍尔夫倡导的叙事革命颠覆了传统的男性话语权威,扩大了女性声音和女性意识的表达空间。

在伍尔夫的小说中,各种意识得到平等呈现,既解构了父权单声,又凸显了女性意识。但女性意识并非只有女性才有,男权思想也并非男性专利。《远航》中的男主人公特伦斯和《夜与日》中的男主人公拉尔夫都是两性同体的代表,他们对女性有着强烈的同情心,并具有男女特质的平衡。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在他们的感召下也悟出了男女融合和社会双重性的原则。人物意识交流能在彼此的意识中得到反映,意识变化能在意识流动中得到自我呈现,这也为作家表达女性主义观点提供了途径。《到灯塔去》中的女主人公拉姆齐夫人被描绘成博爱之母,但“她总是同情男人,好像他们缺少点什么——却从不同情女人,好像她们拥有着什么”^{[4](P75)}。拉姆齐夫人承载着男权社会价值观,她对莉莉的态度也体现出她的男权思想。伍尔夫这种从男性人物阐述女性特点,从女性人物表现男权思想的创作思路并非她求新求异,而是她想真实反映人物内心情感意识的各种矛盾,希望在意识流动中追求平衡。同时,伍尔夫在小说中融合了现实和虚构、回忆和梦境、象征和隐喻,通过多元化个体整合出一个心理合体。因此,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在作者的想象空间中产生了多样性,避免了单一性,从而获得了更高的话语权威。在《海浪》中,六个人物被看成是一个象征性自我的六个原型、六种意识,作者通过这六个人物回忆过去,每个有效的个体适于每个时刻,最终,伯纳德获得了内心的和谐。在《幕间》中,作者制造了各种模糊不清的叙述声音。这些声音既不属于任何人,却又出自每个人之口,最后,留声机发出间歇跳动的声音,象征着新的人类未来对话。纷繁各异的人物声音最终要融入一个整体的声音之中,这就是伍尔夫希望的“能包罗万象并且形成一种延续感的叙事方式,其关键所在正是叙述者权威的整体性”^{[2](P132)}。

从表层文本看,多元化的人物声音具有权威性,取

代了叙述者的声音。然而,从深层文本看,这些不同声音并非如其表面呈现的那样各自独立,也不构成复调小说的对话性和多声部叙事。小说中身份各异的人物常常在语义上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并表现出同一话语风格。我们很难相信在《到灯塔去》中,詹姆斯会说“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这样与他实际年龄很不相称的话,也很难相信“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是莉莉本身对爱情的领悟。可见,作者有意在人物之间散播一种普遍意识,授权人物分享叙事权威,表层文本是消抹了叙述者权威,但深层文本里却以叙述者统筹着五花八门的人物声音,并让它们达到“异口同声”之效,从而建立了一种至高无上、无法复制的作者权威。

三、隐含型叙述者声音——女性气质的距离感

有批评家认为伍尔夫放弃全知视角的叙述者是对叙述者的彻底灭绝。实际上,在表层文本上,叙述者是缺席的,但在深层文本上,叙述者却“无处不在,无所不为”。正如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谈道:“艺术家就像创世的上帝,出现在自己亲手创造物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隐而不见,修炼达到无声无形,若无其事地修剪着自己的手指。”^{[5](P215)}布斯也认为:“虽然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他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6](P24)}在伍尔夫作者型叙述声音中,叙述者声音隐藏在人物声音之后,人物声音成为叙述者声音的延伸。伍尔夫通过大量使用自由间接引语在小说人物和叙述者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并以此获得特殊的隐含型作者权威。

在自由间接引语中,人物内心活动,包括朦胧的潜意识都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毫无作者议论的干扰,读者不经意间与小说人物感同身受,也进一步认同了作者的性别政治主张。在《达洛卫夫人》中,忙于宴会的达洛卫夫人感慨道:“设宴是一种奉献:联合,创造嘛。然而,奉献给谁呢?或许是为了奉献而奉献呢?”^{[7](P115)}奉献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价值取向,象征着女性的附属地位。然而,这位叙述者“披上男性话语的外衣,只是为了随后将其剥去,换上女性话语的外衣”^{[8](P304)}。一句“奉献给谁呢”?道出了女性的心声,女性质疑这种自我价值,朦胧的女性意识逐渐形成。可是,“或许是为了奉献而奉献呢”?充满讽刺意味,“奉献给谁”的问题无法得到解答,“为了奉献而奉献”也难圆自说,这表现出女性自我追求和社会压制中徘徊,最终屈服于社会的无奈,她们始

终无法摆脱奴化思想。在小说中,叙述者通过自由间接引语对达洛卫夫人的话语进行戏仿,这种戏仿巧妙地传达了女性的声音和女性意识。叙述者无需高喊,却在无形中增强了作者权威。

自由间接引语使叙述者和人物融为一体,但这并非否认叙述者与人物需要保持的距离。多萝西·理查森曾执著地建立一种“能与当今男性气质的现实主义等量齐观的女子气质”^{[2](P120)},但却因无法捕捉到其女性主义目的而以失败告终。理查森的女性意识的表现缺乏叙事距离感,其“没有距离的作者消抹”也消抹了她的文学成就。这是因为,女性主体仍处于边缘,代表女性主体的女性写作也难入主流。女性作家只能通过间接、曲折的方式从边缘解构以男性为主体的写作方式。伍尔夫在叙事中谨慎地加入了距离感,追求“没有消抹作者的距离”。她认为作者与人物保持更大的距离,小说就能更好地解释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内涵。^{[8](P199)}布斯指出:叙述者可以在道德上、理智上和情感上远离故事中的人物。这样的距离可以在任何一种可能的特质上形成。^{[6](P176)}在《奥兰多》中,作者不断调整叙述者和人物的距离。当奥兰多还是一位男性时,叙述者是一种远距离的带讽刺性的叙述语气。而在奥兰多变成女性之后,叙述者适当拉近与人物的距离,但仍不失客观地审视和判断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本质,“他们用每一种武器将自己装备起来,而他们甚至阻止我们学习字母”^{[9](P99)}。当男人们送诗请奥兰多过目,称赞她的判断力时,奥兰多想到的是“并不意味着他尊重她的意见,敬佩她的理解”^{[9](P136)}。距离赋予“日常化”的女性题材真实感,具有女性气质。

叙述者就像伍尔夫手中的摄像机,虽不出现在屏幕上,但或不可缺,而且通过调整与人物的距离,使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人物个性、感悟生活本质。隐含叙述者的声音使作者的女性意识在人物意识中自由穿梭,获得表达的最大空间。

四、作者声音的权威性——女性意识的构建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伍尔夫认识到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利关系决定了其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必须遵循在隐含中建立权威的原则。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话语权威被主导意识形态中受过教育的白种男性所掌控,女性没有参与社会话语的权利。西摩·查特曼在探讨伍尔夫的《雅各的房间》中叙述者的意识形态内涵时谈到:“这是一位匿名的女性叙述者。当年轻男士在剑桥大学雅各的房间

中展开激烈争论时,这位女性叙述者只能在房间外面寒冷的院子里徘徊,她听不到男人们在说些什么,只能通过从窗户看到的这个或那个男人的手势,做出一些推测。”^{[8] (P237)} 女性作家在建立女性声音的时候受到限制,这给女性自我权威化带来了阻碍。女性作家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她们对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传统提出质疑,她们努力在批判、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本中建立女性的声音;而另一方面,要跻身于主流文本,她们又不得不采用正统的叙述声音以获得能被大众所接受的权威。面对这样的矛盾,伍尔夫采取迂回策略,以隐含叙述者的声音在遵循与颠覆主导修辞行为方式中保持了微妙的平衡。为此,伍尔夫不得不在作者权威显露和作者隐退之间协商平衡。一方面,伍尔夫追求“向内转”,描写人物的意识深层,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现代派文学的典范;另一方面,伍尔夫采用叙述者“以缺席建立在场”的叙事策略隐含地构建了女性话语权威。这种“由外到内,由显到隐”的发展模式体现了伍尔夫在超越文学规约中创作出的适合女性话语表达的现代派文学模式。

同时,伍尔夫还考虑到读者范围和读者意识。她始终站在女性的角度,关注女性命运,并呼吁女性要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即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独立自主的思想。伍尔夫从小生活在文人世家,她虽然才华横溢却因身为女子而无法进入高等学府学习,这使她自觉成为一位女性主义者。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伍尔夫的写作仍是站在白人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带有种族优势和阶级特权的烙印。从《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表达方式来看,她竭力不得罪男性读者,也没有冒被家庭、读者和自己的社会群体所唾弃之险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表现出来,其所持的“双性同体”观也带有乌托邦色彩。客观来讲,伍尔夫的写作虽然受到其阶级观念的限制,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她能提出“双性同体”的两性和谐观,是成熟女性写作所具有的一种宽厚放达的美学风格。

五、结语

面对男权社会压制和现代主义文学规约,伍尔夫机智地化制约为创新,在既没有脱离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叙事常规、又在打破这种常规的情况下表达了女性意识。她巧妙地把叙述者声音隐含在多元的人物声音中,树立了作者的权威声音。这种间接、迂回的写作策略既为现代女性文学开辟了道路,也体现了女性书写的含蓄美、创造力和爆发力。同时,伍尔夫把握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趋势,其具有辩证整体观的女性主义思想也正印证了她的伟大之处。

[参考文献]

- [1] 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2] (美)苏珊·S. 兰瑟. 虚构的权威[M]. 黄必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3] 唐伟胜. 性别、身份与叙事话语: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流研究方法[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5).
- [4]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到灯塔去[M]. 马爱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5]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New York: Viking, 1964.
- [6] (美)W. C. 布斯. 小说修辞学[M]. 华明,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7]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达洛卫夫人[M]. 孙梁,苏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8] 申丹.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9]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奥兰多[M]. 韦虹,昊乐,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张 丽】